

宁夏古代最大的湖泊——千金陵(下)

《水经》记载的黄河故道：与千金陵吻合

黄河，古称河，或称河水。黄河之名首见于西汉。但直到魏晋南北朝，各种史籍仍多称“河水”，叫黄河的极少。隋唐间，以河水多泥沙而色黄，才普遍叫黄河。

黄河进入宁夏后，由于流速减缓，上游带来的泥沙不断沉积，形成冲积平原。尤其是青铜峡以下的银川平原，地表与河水的高差不大，全部是淤积土，没有石质崖岸约束。所以，从青铜峡到石嘴山一段，河床游荡，小的改道难以备述，比较大的一次改道约发生在三国至东晋十六国，即《水经》成书到郦道元作注之间。可惜此间宁夏平原不在中原朝廷控制中，故史籍不载。但从《水经》和郦道元的注文中，可以找出一些证据。

下面是《水经注》描述河水从青铜峡至石嘴山段的原文。为与郦道元的注文相区别，特将郦注加括号。

河水又北迤北地富平县故城西。(河侧有两山相对，水出其间，即上河峡也，世谓之青山峡。)河水历峡北注，枝分东出。河水又北迤富平县故城西(秦置北部都尉，治县城，王莽名郡为威戎，县曰特

武。建武中，曹凤字仲理，为北地太守，政化优异……河水又北薄骨律镇城，赫连果城也，桑果余林，仍列洲上，但语出戎方，不究城名，访诸耆旧，咸言故老宿彦云：赫连之世，有骏马死此，取马色以为邑号，故目城为白口骊韵之谬，遂仍今称，所未详也。河水又迤典农城东(世谓之胡城，又北迤上河城矣，世谓之汉城。薛瓌曰：上河在西河富平县，即此也。冯参为上河典农都尉所治也)。河水又北迤典农城东(俗名之为吕城，皆参所屯以事农亩)。河水又东北迤廉县故城东(王莽之西河亭，《地理志》曰：卑移山在西北)。河水又北与枝津合。(水受大河，东北迤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今无水……)河水又东北迤浑怀障西(《地理志》曰：浑怀都尉治塞外者也。太和初，三齐平，徙历下民居此，遂有历城之名矣，南去北地三百里)……

《水经》说得很清楚，这段黄河的主流叫西河。另有一条枝津，在金积堡附近“枝分东出”，到浑怀障附近与主流汇合。郦道元注枝津“以溉田圃”，是作灌溉之用。

从《水经》的原文看，河水主流刚东流过富平城西(今吴忠市利通区金积镇至关马湖一带)，便改变

方向，折向正北方，经(南)典农城(今青铜峡市邵岗西，即汉代、唐代的灵武县)；继续正北流经(北)典农城(今永宁县西玉泉营一带)东；然后又东北经廉县(今暖泉村)之东，再折向东北至塞外浑怀障(平罗县陶乐镇西南)。这段黄河的流向，有三个重要节点：一是在金积镇折向北。二是在青铜峡市邵岗镇附近继续向北。三是流经廉县故城东，这个汉县在王莽时改名西河亭，说明距黄河主流(西河)不远。廉县遗址尚在，位于今平罗县下庙乡暖泉村。将金积、邵岗、暖泉东侧三点相连，正是《水经》成书时的黄流主流走向。按照今天的地名描述，黄河出青铜峡后，先东流约10公里，然后折向正北，经青铜峡市的连湖农场、银川市의西湖及阅海公园、贺兰县的常信、暖泉，然后折向东北至平罗县的陶乐镇。《水经》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早至汉代的桑钦，晚到晋代的郭璞，其中倾向桑钦的较多。据此，可以把上述走向当作两汉黄河的河道所经。其中永宁县西、银川市金凤区一段，与唐朝的千金大陂吻合。

显然，这不是一种巧合。银川平原稍大的湖泊，多是黄河变迁

后，故道深处积水而成。两汉至南北朝间，这段黄河经历了一次大的改道：主流东移到枝津，走向与今天的黄河干流相去不远。留下的故道，便成为长湖。唐仪凤二年(677年)一次小的改道，冲毁了怀远县城，不得不于次年在其西10公里另筑新城。到西夏时，河道又向东回移，便在今银川市兴庆区掌政之东留下十几公里的条状湖泊，当地百姓从清代就称之为“长湖”。现在的鸣翠湖，仅是长湖的一小部分。

也许有人会问：同是黄河故道，为什么青铜峡市邵岗堡以南没有大的湖泊？原因只有一个：黄河改道后，旧河道变成一槽不流动的死水；南段仍与新的主流通连，黄河水的洪水仍可进来，泥沙也随之不断沉积，直到将旧河道填平。而邵岗堡以北因距离远，带泥沙的洪水不可能进入，淤积程度也就小得多，所以能留下一段长湖。此外，银川市近年的建筑施工，也发现过古河道的实物证据。在老城与新城之间，即千金大陂所经之处，如北京中路的中部，各大型建筑物开挖基础，地表以下先是灌淤土、湖积土，约9米厚，很厚一层黄亮亮的河沙，也说明是古河床。



红军西征在宁夏

1936年5月，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胜利回师陕北后，14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川县太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部署西征。会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敌我态势及陕甘根据地面临的情况，决定继续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组织西方野战军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陕甘宁边界地区进攻，进行西征战役。其主要任务是打击坚持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部势力，创建新的根据地，发展壮大红军力量；打通与红二、四方面军的联系，早日实现三大主力会师；争取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及一切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促进全国抗战新局面的早日形成。

5月18日，党中央发布了西征命令及西征战役计划，以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及骑兵团共1.3万余人，分左、中、右三路向陕甘宁边界地区进军。5月19日至23日，各路红军相继从延长、延川地区出发，分别向预定作战地域推进。红一军团为左路军，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红二十八军与第八十一师等部组成中路军。

西征战役历时2个月，对坚持反共的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部予以沉重打击，俘敌2000人，缴获各种枪200余支(挺)战马500余匹，解放了盐池、固原、同心、海原等广大地区，解放城镇10余座，开辟了纵横各200公里的新根据地，将陕甘苏区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7月底，西征战役胜利结束，西方野战军主力在豫旺地区集结休整。8月初，党中央指示西方野战军以巩固求发展，大力巩固西线胜利，努力发展东线游击战，扩大红军，加强军事训练，团结争取东北军和其他国民党军队，准备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9月，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西征红军向、向南挺进，有目的地向西兰公路延伸，以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并预防敌以西兰公路为界，隔断西征红军与红二、四方面军的会合，为大会师创造条件。

西征红军开展了建党建政工作。西征红军在宁夏先后建立了静宁县委和固原县工委，同时建立了盐池、豫旺、固北、静宁县苏维埃政府。这些地方还建立了区委和区、乡两级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商会、工会、团委、统战等党群组织和赤卫队、游击队等地方武装。根据地的扩大、地方政

权的建立，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西征红军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西征的主要任务之一。西征红军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打通了道路，实现了党中央关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战略目的。

西征红军开展了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彭德怀亲自给何柱国、王以哲等东北军将领写信，阐述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副主任邓小平亲临一线进行指导。红军战士们还深入到东北军的阵地中进行宣传。红军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渐消除了两军之间的敌对情绪，许多东北军官兵逐步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张学良、杨虎城接受了联合抗日的方针，并积极推动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马鸿逵、马鸿宾部队的部分官兵逐渐接受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改变了对红军的敌对状态，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西征红军认真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西征红军模范地执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及有关规定，坚持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回族风俗习惯。1936年10月22日，经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批准，我国第一个县级回族自治政权——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诞生。它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民族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光辉实践。

红军西征为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打开了一扇窗户。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他于1936年6月至10月，在红军西征期间，来到宁夏境内的红军西征前线一豫旺地区进行采访。斯诺是在红色区域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他根据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西行漫记》一书中，四分之一的内容是在宁夏完成的。斯诺在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讲述红军在宁夏境内的活动，记录了回汉群众与红军战士的鱼水之情，用大量事实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军事，尤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据西吉县融媒体中心)

银川市解放初期党组织建设(下)

银川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于1950年8月10日至10月底进行了为期80天的整风运动。8月10日至25日为第一阶段，是准备阶段。全市各单位分别进行深入动员，消除党员干部的思想顾虑，认真学习文件，结合讨论，揭露问题。学习的主要文件有《斯大林与毛泽东论自我批评》、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还有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反对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等。银川市委成立了以市委书记马俊杰为主任，市长孙璞为副主任，王复周、牛祥等为委员，共9人组成的学习委员会。各单位也成立5人至7人的学习委员会，吸收党外积极分子参加并建立了汇报制度。要求各学习委员会每10天向市委汇报一次学习进展和党员思想状况。市委学习委员会每阶段向宁夏省学习委员会做一次书面汇报。运动期间，每天学习讨论3个小时(早2晚1)。

8月26日至9月15日为第二阶段，是暴露问题阶段。这个阶段各单位开展热烈讨论、自由争辩和批评与自我批评。银川市委针对暴露

出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贪污浪费、脱离群众等问题，召开历时7天的市、区两级党员干部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整改措施。9月16日至9月底为第三阶段。全市各单位以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为指导，深入讨论关于改进机关工作的意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做好整风总结。

这场整风运动，全市共有364人参加。(其中党员76人，团员37人)，暴露出的问题共406个。整风运动后期，按照党纪、政纪，严肃处理了一批犯有严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干部和党员，其中28人被开除党籍或逮捕法办。

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银川市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指示精神，于1951年下半年至1953年底提出要用1年多的时间，对全市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整顿，重点解决党的基层组织 and 党员队伍中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等问题。整党运动分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思想教育。进行反复的思想动员，打消党员的各种顾虑，统一认识。在教育中密切联系党员的思想实际，充分利用支部的内在力量，在教育提高的基础上，针对党员标准八项条件，检查每个党员的工作、思想、作风、观

点、立场等问题。第二步，登记、审查和整理。首先向党员讲清登记、审查的目的和意义，要求老老实实向党交代清楚一切问题，根据暴露出问题的性质、本人的一贯表现、对错误的认识及检讨程度与改正错误的决心分别对待，并作出适当的结论和处理。第三步，改选支部和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巩固整党成果。各部门都结合实际，进行了制度建设，健全民主集中制，请示汇报制度、机关财务制度、人事制度、监察制度以及工作、学习制度等，改变“党不管党”的现象。

1951年9月14日，银川市委抽调各区组织委员及机关、工厂党支部书记14人，举办训练班19天，进行培训，派至各单位开展工作。市委又召开市、区两级干部会议，讨论银川市整党工作计划，对全市整党工作进行部署。之后，全市各基层单位以支部为单位，在组织学习和对照党员八项标准进行教育的基础上，对每个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全市第一批参加整党的党员有112人(五、六两区机关农村工厂学校及市法院、宁夏师范以及城市的街道党员未参加)。经过整党，够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党员108人，不够党员条件的党员4人。这次整党，不但提高了现有党

员的政治觉悟，而且纯洁了党的组织。如在整党中发现有些党员认识模糊，不了解党的性质，不了解入党为了什么。有些党员对党组织不够忠诚，隐瞒历史、家庭成分。在整党中发现隐瞒家庭成分者4人，隐瞒国民党籍1人、会道门者7人。另外，也有混到党内来的，如五区的马某某系国民党骨干分子，解放后曾勾结土匪阎廷芳组织暴动，准备上贺兰山打游击，与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抗。在清剿匪特中，土匪阎廷芳被镇压，马某某又假装进步，混进党内，欺压群众，贪污腐化，这次整党被清除出党。在整党后期，银川市委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进行建党工作。截至1953年6月，全市各机关、工厂、学校共发展新党员188名，建立支部17个，另外培养入党积极分子194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刚刚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就清醒地意识到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目的就是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巩固的党。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依然保持战争年代的青春和活力，才能强有力地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银川党史网)

移民岁月

第九十八期

YI MIN SUI YUE

电视剧《灵与肉》的原型来源于宁夏农垦(三)



为种猪做健康检查。

严纪彤、王柏玲学的都是畜牧专业，每天的工作就是和牲畜打交道。严纪彤以大型家畜为重点进行马匹改良，每天上午到站、队的马圈做直肠检查，下午做人工授精术，并管理全场畜牧业生产。王柏玲则在养猪场从事猪种改良，培育良种，开展人工授精技术工作。大家对一个女同志搞这类工作都觉得稀奇，但当看到满圈的猪仔撒欢时，都被她渊博的知识和辛劳的工作所感动。“王柏玲是个畜牧能人”也在农场渐渐传开了。

严纪彤、王柏玲在艰苦环境中能取得如此成绩，归根到底是他们心中充满爱和力量。

1957年3月，严纪彤、王柏玲的大女儿出生。严纪彤赶着毛驴车把母女俩从县城医院接回家里，因为天气寒冷，加之王柏玲身体虚弱，就在屋里点上了煤炉取暖。有一天晚上，严纪彤去开会，王柏玲母女俩不知不觉睡着了。然而，满屋煤烟致使王柏玲发出了重重呻吟，隔壁邻居听到后立刻推门而入，救出了母女俩。严纪彤很快赶回家把医生请来诊治，经过很长时间的诊治，母女转危为安。

1959年8月，二女儿出生。为了工作和照料两个孩子，严纪彤把父母接到灵武农场。当时农场住房紧张，一家六口挤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随后，经过向领导呈请报告，严纪彤、王柏玲又获得了一间分配的小屋。

1960年，遇上“自然灾害”，农场口粮标准由原来每人每月供应二十六市斤下降到十七市斤，农场号召“瓜菜代，集草籽，挖鼠洞，度饥荒。”为了挺过这困难时期，王柏玲带着三岁的大女儿，到田埂上去挖老鼠洞找粮食，采集蒿草籽。

当时由于粮食大减产，每日每头猪只供给二两高粱或玉米。农场想方设法动员职工打野草、收苕壳，把猪放牧到荒郊野地里啃吃草根，挖苍耳野菜等等。到了秋冬季节，大猪小猪还是很瘦弱，甚至有大批的猪死亡。那时严纪彤是畜牧队长，主管三个养猪场，只要有问题，他就必须深入猪舍了解。大家看到这种情况，都知道大猪缺料，小猪缺奶而大批死亡。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中，没有人敢直接说明。于是在一次探讨死猪原因的会议上，一位兽医说猪死亡的原因是“中毒”，大家给大、小猪灌药打针，不分昼夜进行抢救，但是仍然有大批猪死亡。与此同时，农场再次召开讨论分析会，却不允许严纪彤、王柏玲参加。会上，大家议论纷纷，说毒一定是严纪彤投放的，这种毒药是王柏玲的亲友从国外邮寄来的。农场领导还派人带着死猪标本样品到科研院所去化验，甚至请公安部门介入调查。即便化验结果证实并不是毒药致死，对严纪彤、王柏玲的怀疑和监视却没有结束。

(崔殿龙 祖宁平 撰稿)

支宁教师 西行铺路 ——记宁夏大学原校长张奎(一)



上世纪80年代张奎讲物理课留影。

张奎，原籍北京，1937年出生、中共党员，1958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志愿支宁，分配到宁夏大学，成为宁夏大学第一批奠基人。个人喜爱数学却教起了物理，从讲师起步到了教授，并担任过宁夏大学物理系主任、副校长、校长，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最大的喜好是当个好老师，当校长时稳步推进改革硕果累累，在教师岗位上如鱼得水轻松自如。

结识宁夏大学原校长张奎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交流多的是在1993年到1997年，因他是全国人大代表，我作为随团记者，每年3月初到3月中旬，十六七天时间都与十多位宁夏代表在一起，采访拍摄他们开会议政、共商国是，听代表们怎么说、看代表们怎么做，白天工作后有较多的时间与他们私下交流，无拘无束，聊到深处时会持续到深夜，掏心掏肺，无所不及。

张奎属于学者型干部，身体微胖，平时戴有深度眼镜，一口纯正稍慢的京腔总会给人亲切感。会议分组讨论时发言不十分踊跃，别的代表发言时他总会认真的记录，一旦发言又往往语出惊人，思路清晰、逻辑严谨、给人

特立独行之感、观点鲜明、不随波逐流的发言多是独立思考后的总结和提升，这与全国人大代表讨论时抢着发言很是不同。

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的发言少有条条框框、观点鲜明的独立表达更多体现了自由与民主。这里举两个印象深刻的例子。1996年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参加宁夏代表团的审议，宁夏代表团提前一天接到通知，发言主题也做出了基本划定，指定的几位发言人中有张奎，因他是宁夏大学校长，所以想请他谈教育问题，也有为宁夏教育争取资金支持的味道。当时宁夏正在推进“231工程”，即提升农村农民素质教育、推动农民增收的一项自治区工程，最先提出实施这项工程的是自治区主席白立忱。

张奎在发言中也提及到宁夏的高等教育现状及希望国家帮助解决的问题，但更多的关注点放到了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方面。姜春云在听取他的发言后说：国民教育还是要从培养高素质人才入手，也可看出副总理对培养高素质人才更是情有独钟。对此张奎提出不同意见，他说：“从国家层面看，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但在贫困落后、教育水平整体偏低的宁夏，提升农民科学和文化素质可能更为紧迫。”在讨论中，领导引用了教育要为建设服务、要为民工兵服务的理论，张奎代表再次表达出不同意见，并很幽默地表示，教育的本质就是提高国民素质，教育不能一会为这个服务，一会又为那个服务，只应该为提高全体国民素质服务，而这种服务要“从一而终”。他的发言引发了笑声。我把这段发言写入稿件中，但最后审稿时没有通过，成为少数几个人知道的历史。(简银生 撰稿)